

天一阁文丛

第一辑

TIANYI PAVILION SERIES 天一阁博物馆 编



天一阁文丛 编辑委员会

顾问

- 任继愈 著名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
毛昭晰 著名历史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原全国人大常委、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省文物局局长
来新夏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原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系主任、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傅璇琮 著名出版家，原中华书局总编辑、编审、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秘书长
骆兆平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天一阁博物馆研究员，原天一阁文保所所长

主任

- 史小华 宁波市文化局局长

编委

- 王子舟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教授
王世伟 上海图书馆副馆长、教授
邓洪波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室主任、教授
韦力 中国当代著名藏书家、藏书文化研究者
艾思仁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中国古籍国际联合目录》主持人
沈津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古籍部负责人、研究员
陈宁雄 宁波市图书馆馆长、副研究员
岡雅彦 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前副馆长、研究员
孟建耀 宁波市文化局副局长
姚伯岳 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副主任、教授
徐良雄 天一阁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
徐建成 宁波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助理
徐雁 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
袁逸 浙江大学地方文献部主任、研究员
袁慧 天一阁博物馆古籍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高桥智 日本庆应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研究员
龚烈沸 天一阁博物馆方志部主任、副研究员
董贻安 宁波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
虞浩旭 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主编

徐良雄

执行主编

虞浩旭

目 录

访 谈

- 藏书文化交谈录 来新夏 焦静宜(1)

探 索

- 试论明代书院的藏书事业及特点 邓洪波(5)

- 藏书家与文学 曹培根(18)

- 中国古代藏书家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王增清(25)

- 天一阁与明代的科举名录编纂 钱茂伟(34)

- 天一阁与五桂楼藏书借阅制度之比较 诸焕灿(43)

- 从苏州园林看中国古代藏书家 马杰(50)

- 明清苏州藏书家抄书活动探析 石明芳(56)

- 从杨氏海源阁看清代私人藏书 郝云昌 田金芝(64)

论 说

- 海宁藏书家浅析 来新夏(70)

- 魏晋南北朝佣书业和藏书事业的发展 陈德弟(78)

《古今图书集成》与天一阁

- 兼论清帝弘历对天一阁的特殊关注 袁慧(87)

- 徐时栋和他的藏书楼 饶国庆(99)

- 清代苏州刻书业和地方官 陈亦伟(106)

- 苏州藏书家藏书印 费渝庆(111)

- 文宗阁藏书楼溯源 徐苏(117)

- 从嘉德春拍古籍善本谈曹大铁藏书 仲伟行(123)

- 侵华日军在浙江地区的图书文物劫掠 乐敏 赵建民(132)

关 注

- 现状不容乐观 谁来拯救中国藏书楼? 郑黎(146)

- 私家藏书楼乏人问津 顾军(152)

- 苏州私家藏书楼寻踪 陈建忠 孙迎庆(155)
宁波市市区现存藏书楼情况调查 虞浩旭(162)
嘉业千秋
——写在嘉业藏书楼创建80周年之际 袁 逸(165)
难忘四明范司马
——写在我国杰出藏书家范钦诞辰500周年和天一阁建阁440周年
即将到来之际 袁元龙(172)

发现

- 藏书与读书的文化庄园 文先国(179)

交流

- 日本古代藏书楼考察记 好 虚(183)
新编地方志征集渠道途径与经验体会谈 龚烈沸(187)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工作 吴 平(193)
战火劫难 古籍新生
——记清华大学藏焚余古籍的修复及整理 刘 蕃(199)
怎样使古籍养护更上一层楼 李大东(207)

人物

- 略论目录学家、藏书家姚振宗 范凤书(210)
姜德明的书籍世界(上) 朱 敏(214)

考证

- 范钦著作考略 骆兆平(237)
范钦与《烟霞小说》 骆兆平(240)
天一阁史事考(二则) 袁良植(242)
天一阁进呈书籍之命运 徐建成(247)
《周官精义》是一部什么书 吴定安(251)

忆往

- 梦回杭州旧书市(外一篇) 陈伯良(256)

序跋

- 《中国旧书业百年》弁言 徐 雁(264)

CONTENTS

Interviews

- A Record of the Conversation about the Book Collecting Culture *Lai Xinxia & Jiao Jingyi*(1)

Probe

- On the Book Collecting of the Academies and Its Peculiarities in the Ming Dynasty *Deng Hongbo*(5)
- Book Collectors and Literature *Cao Peigen*(18)
- On the Func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Book Collectors in Higher Education *Wang Zengqiang*(25)
- Tianyi Ge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irectory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Qian Maowei*(34)
- A Comparison of the Lending Regulations between Tianyi Ge And Wugui Lou *Chu Huanchan*(43)
- A Glimps at the Ancient Chinese Book Collectors through the Suzhou Gardens *Ma Jie*(50)
- An Analysis of the Suzhou Book Collector's Book Copying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Shi Mingfang*(56)
- A Look at the Private Book Collecting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Yang's Haiyuan Ge *Heng Yunchang & Tian Jingzhi*(64)

Comments

-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Book Collectors of Haining *Lai Xinxia*(70)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ok Copying Business and the Book Collecting Enterprise in the Wei, Ji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Dynasty	<i>Chen Dedi</i> (78)
Tianyi Ge and <i>A Collection of Books of the Ancient Time and the Present Age</i> -----on the Special Attention to Tianyi Ge by Hong Li, An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i>Yuan Hui</i> (87)
Xu Shidong and His Library	<i>Rao Guoqing</i> (99)
The Printing Industry and the Local Officials of Suzhou in the Qing Dynasty	<i>Chen Yiwei</i> (106)
The Book Seals of the Book Collectors in Suzhou	<i>Fei Yuqing</i> (111)
A Review of the Wen Zong Library	<i>Xu Su</i> (117)
On Jia Dechun's Auction of the Ancient Rare Books and Cao Datie's Book Collecting	<i>Zhong Weixing</i> (123)
About the Japanese Invaders' Plundering of Rare Books and Cultural Relics in Zhejing	<i>Le Ming & Zhao Jianming</i> (132)

Concerns

The Present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Who Can Rescue the Chinese Libraries?	<i>Zheng Li</i> (146)
Private Libraries Are Scarcely Cared about	<i>Gu Jun</i> (152)
A Visit to the Private Libraries in Suzhou	<i>Chen Jianzhong & Shun Yingqing</i> (155)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xisting Libraries in Ningbo Urban District	<i>Yu Haoxu</i> (162)
A Review of Jiaye---to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Jiaye Library	<i>Yuan Yi</i> (165)
On the Unforgettable Fan Sima of Si Ming---In Memory of the Distinguished Book Collector Fan Qing's 500 -year Birthday and the 44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mpletion of Tianyi Ge	<i>Yuan Yunanlong</i> (172)

Discovery

- A Cultural Manor of Book Collecting and Reading *Wen Xianguo*(179)

Exchanges

- An investigation to the Ancient Japanese Libraries *Hao Xu*(183)
On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ng Channel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Newly Edited Local History *Gong Liefei*(187)
A Brief Statement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Ancient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Hua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Wu Ping*(193)
The New Life of the Ancient Books Survived the Fires of the Wars---On the Restor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Burned Ancient Books in Tsinghua University *Liu Qiang*(199)
On Further Maintenance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Ancient Books ... *Li Dadong*(207)

Figures

- A Brief Talk About the Bibliographer and Book Collector Yao Zhengzong *Fan Fengshu*(210)
About Jiang Deming's World of Books *Zhu Ming*(214)

Textual Research

- A Brief Research of Fan Qin's Works *Luo Zhaoping*(237)
Fan Qin and the Yan Xia Novel *Luo Zhaoping*(240)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ianyi Ge *Yuan Liangzhi*(242)
The Ending of the Books Presented as Tribute by Tianyi Ge ... *Xu Jiancheng*(247)
A Discussion of *An Illustration of the Official System in Zhou Dynasty* *Wu Dingan*(251)

Memories

Going Back to Hangzhou's Second-hand Books Market in the Dream

..... Chen Boliang(256)

Preface and Postscript

Postscript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hinese Second-hand Books

..... Xu Yan(264)

藏书文化交谈录

焦静宜(南开大学出版社编审)
来新夏(南开大学教授)

焦:近一时期,我看您好像又在转移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不断读了您不少有关藏书文化的文章,许多学术研讨会都被你婉谢,唯独对有关藏书文化的研讨会,是每请必到。是否又对藏书文化感兴趣了。

来:是有这种倾向。我最近三四年,确实把很多精力放到藏书文化的研究上,看有关图籍,查阅有关资料,研究有关藏书家和他们的著述。思考有关藏书文化的缘起和发展,以及藏书理论的嬗变等等。

焦:我猜想您是在撰写《中国图书事业史》的过程中,发现这一课题的,不知对不对?

来:确实如此。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出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和图书馆学系主任以后,一直认为要钻研一门与工作有关的学术领域,于是就从历史学专业转向图书文献学专业,并利用自己对文献典籍比较熟悉的优势,确定撰写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图书事业史。在撰写过程中渐渐感到藏书在图书事业中占有相当地位,于是注意搜集和积累一些有关资料,到九十年代以后,就开始撰写有关藏书文化的文章。

焦:照您所说,中国的藏书事业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来:据我所见到的资料,“藏书”一词,始见于《韩非子·喻老》篇。当然,一个专用词的固定,必然先有一段事实的发展过程,所以中国的藏书事业应当认为与图书事业并起,也就是说自简书出现,便为藏书事业奠定基础。大致估算中国的藏书事业当在二千年以上。

焦:中国有如此悠久的藏书历史,它是怎么发展下来的?

来:主要是中国较早地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藏书机构,成为世界上鲜见的藏书体制。中国的藏书体制大致分为官藏、公藏和私藏。官藏和私藏约同时兴起,而公藏稍后。根据文献考察,从西周中期以来,官藏典籍似已有专职管理人员。《左传·昭十五

年》记周襄王和大夫籍谈谈话时，曾指出籍谈的九世祖曾掌管过晋国典籍，并由此而得姓，但还不能认为已有专门管理机构。真正意义上的官藏专门管理机构是老子为周王室“守藏室之史”的“藏室”。直到东汉延熹二年（159年）建立管理图书的中央最高机构——秘书监，才正式列入国家职官系列。历代藏书机构名称，虽多有变化，但设置不废。第一代的私藏当始于孔子整理六经和诸子百家的争鸣。历代私藏事业一直在发展、丰富，有很大的成就。公藏是指社会教育、宗教机构如书院和寺庙的藏书。这三大藏书体系构成中国完整的藏书体制。

焦：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藏书文化是不是就指这三大体系？

来：当然不全是。社会上凡称得上是文化现象的，都应有比较丰富的内涵。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试探性地作过一些概括，我说：“中国的藏书文化伴随着图书的产生而出现，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它以逐渐完善的藏书机构为保证，以专门收藏家和研究者所建设与藏书文化有关的多种专学为羽翼，并以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为主要支柱，围绕着藏用关系的演化，不断地润泽着全民族，形成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结构之一。”这一内涵的概括是否恰当，希望同道商榷！

焦：我曾看到一篇有关藏书文化的综述性文章，说您是首先提出中国藏书文化中蕴涵着人文主义精神，是吗？你所说的人文精神，具体何所指，是否能见告其详？

来：谁先提出问题，无关重要。主要是藏书文化中是不是蕴涵着这种人文精神。我所说的人文精神的核心就是“仁人爱物”。所谓“仁人”，便是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结起来，使所藏尽量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所谓爱物首先表现在对图书的爱护上，这种“仁人爱物”的人文精神浸润着历代的藏书事业，从而使全社会都能从“仁人爱物”的角度来重视藏书，赋予藏书文化以旺盛的生命活力。我曾为天一阁题词说“仁人爱物 润泽全民”。这在历来文献中多有记述，可以检读，不再一一叙说。

焦：中国藏书历史，既如此悠久，并且已构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那么有没有一种基本理论在指导他的发展？

来：当然有。中国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就是围绕着藏与用的问题而展开的。从整个中国藏书史的发展过程看，“藏”似乎是重要支点，而“用”往往处于一种次要地位。所以最早出现的有关专用词叫“藏书”。孔子是有确实姓名的最早整理与再编撰典籍的人，必然收集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他还确定了两条藏书原则即“去其重”和“可施于礼义”者。若干士人为了游说各诸侯国求取功名利禄，或宣传个人学术观点，也必然有藏书。荀况更提出图书分类的指导性原则，如“以类行杂”和“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等几千年不磨之论。他们的“藏”实际上又多少包含着“用”的意思。韩非在

《五蠹》篇中曾说过，言政治的人，收藏商鞅、管仲的书，言军事的人，藏孙武、吴起的书，“用”的内涵十分明显。直到汉武帝为实现其大一统的军事行动的需用，从积如丘山的藏书中辑录军事资料，编成《兵录》的活动，更说明藏用的结合。历代对典藏制度十分注重，力求逐步完善，明清以来，以藏为主的藏书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明万历时的大藏书家祁承的《澹生堂藏书约》便是一部比较有系统的藏书建设的理论著述。他的观点主要着重于如何完善和加强“藏”的问题。明清之际的曹溶写过一部《流通古书约》，将以藏为主向用的方向倾斜，使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得到一定的充实。清乾隆时的著名学者和藏书家周永年提出《儒藏说》的藏书理论。他跳出了历来私人藏书的小圈子，提倡由社会承担起藏书的责任，使藏书为社会服务。他还捐资自建“借书园”试验自己的主张，为“好学深思之士”创造“博稽载籍，遍览群书”的条件。可惜效果不佳，但他的《儒藏说》却丰富了藏书文化理论的内容，为藏书向公众开放，为藏书楼向图书馆迈进，起到先驱作用。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化，西方文化的频繁渗透，藏书理论由以藏为主向藏用结合方向发展。二十世纪初期，浙江绍兴地方士绅徐绍兰父子，筹资修建古越藏书楼，除提供家藏，还采购新书刊，向社会公众开放，公开借阅。它虽仍以藏书楼为名，但已具近代图书馆的雏形。使藏书文化的基本理论已完成从以藏为主，经由藏用结合，而走向以用为主的趋势。近二三十年图书类型有明显变化，在纸书以外，有各种不同载体。这些载体体积小，个人收藏容易，网络化更能广泛涉猎，“藏”的意义相对减弱，更多的思考是如何通过高科技手段便利与“用”。因此，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藏书事业。

焦：在世纪前后，藏书文化为什么能受到学术界关注而提到研究日程上来了呢？

来：一方面学术界特别是图书文献和古籍整理方面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实践中发现藏书文化是一个颇为值得注意的研究领域而积极投身其中，另一方面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一代不像他们前辈那样有藏书的癖好，甚至连“藏书”这一词汇也在他们头脑中接近消失，更谈不上藏书文化的研究了。因此就促使有些人觉得应该竭尽全力来提供和宣传以仁人爱物为中心内容的藏书文化，实际上这也是社会道德应有的内容。我不知道他人是什么动机，至少我是由于有着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焦：你是不是介绍一些目前藏书文化的研究状况？

来：藏书文化的研究和藏书风气的兴起大致是同步。从八十年代开始，有些有识之士就开始藏书活动，大家常提起的人如北京的田涛、韦力是新一代的藏书家。田涛

是在一些祖遗的基础上发展，而韦力则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他用经商所得聚书，颇多珍善。与此同时若干有关藏书文化的撰著和论文相继问世，为藏书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到世纪之交时，藏书文化日益走向热潮，这不能不归功于宁波天一阁多次组织研讨会，推动学术交流。两部藏书文化的巨著《中国藏书通史》和《中国藏书楼》都是在天一阁召开的研讨会上敲定的，并于世纪之初相继在南方和北方出版问世。其他还有《藏书与文化》、《中国近代藏书文化》、《中国藏书家印鉴》、《中国私家藏书史》、《近代江苏藏书研究》、《明清藏书家藏书印》、《山东藏书家史略》、《中国私家藏书史》、《开放的藏书楼开放的图书馆》、《海宁藏书文化研究》、《徽州刻书与藏书》、《历代名人与天一阁》、《古书收藏》等大量著述。山东齐鲁书社还编辑出版了《藏书家》的专业性刊物。同时一大批藏书文化的研究者也已构成一个实力较强的研究群体，老中青都有，如范风书、骆兆平、桑良至、顾志新、周少川、李性忠、徐雁、袁逸、韦力、虞浩旭……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范风书先生，一生从事私家藏书的研究，至老不衰，令人钦敬，在他的晚年，终于撰成《中国私家藏书史》，这一著述，资料丰富，考证详明，立论谨严，为藏书文化研究中不刊之作。韦力和虞浩旭二君正在盛年，为藏书文化研究领域中极具实力的后起之秀。韦力以经营所获，摒弃生活享受，出私囊广搜珍善，着意爱护保藏，并走访海内藏书楼遗址，以其知见，著书立说，当今物欲横流之际，若韦力者，实属难得。虞浩旭则以研究藏书文化为一生志，供职天一阁，不慕荣利，默默耕耘，所著有关藏书文化著作多种，并以天一阁为基地，积极推动藏书文化的研究，厥功至伟。还有许多可以谈及的人和事，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焦：你给我讲了这么多有关藏书文化的人和事，历史和现状，使我对藏书文化有了概括性了解，您可能有点累了吧！对这一专题谈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再交谈。

来：今天也就谈到这儿吧！耗费你不少精力，谢谢！

试论明代书院的藏书事业及特点

邓洪波

【摘 要】 本文分四个部分阐述明代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历程,揭示古代藏书事业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探讨书院藏书管理的制度化建设。认为明代书院藏书受崇尚悟性的王湛心学思潮的深刻影响,虽然事业终无盛势,而且藏书规模不大,但书院编制院藏书目,规范管理制度,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古代目录学、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明代书院 藏书 心学思潮 院藏书目 管理制度

一、明代书院藏书事业发展概略

有明一代,“书院之建非制也”,其发展历程颇为艰辛:前期不受重视,后期则遭到几次禁毁。尽管如此,但书院依凭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不断满足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不同文化需求,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经过王守仁、湛若水等一代学术大师提倡之后,仍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形成辉煌盛势。据统计,明代书院总数至少有1962所,其中新建1707所,修复255所。分布范围扩大,西及今甘肃、云南,北达今辽宁、吉林,以今江西最多,广东、福建、浙江分居第二、三、四位。^[1]

纵观明代书院的藏书事业,它与当年书院盛势不相应,呈现相对低平之态。宋元以来书院藏书兴旺发达的势头尽失,再也见不到那样多孜孜以求的收藏之人,皇皇数十万卷的院藏之数亦不见于文献记载。然而,这并不是说有明一代书院的藏书事业就停滞不前了。事实上,尽管它无盛势,但仍以自己的方式在向前推进。以朱明一代为单位考察,书院的藏书事业以明初为底线,整体上基本呈上升趋势,直至明末战乱,其势才颓。

洪武年间，前朝书院藏书大多已灰飞烟灭于改朝换代的兵火之中，而政府又不主张创修书院以为文化教育机关，总体而言，这个时期书院藏书下降到了宋代以来的最低点，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成化年间，其间一百余年（1368—1487）都没有大的改变，是为明代书院藏书的低迷期。然而，这个时期的书院藏书如同其书院一样，也不是无事可纪。一些士大夫创建的书院沿因宋元之习，仍有谋求藏书之举。以江西为例，在吉安府吉水县城南文江，洪武初年，有邑人刘惠定建仁山书院，“其子龄增构馆阁，聚古今图书，以待来学者”。^[2]在临江府新喻县，邑人梁寅也于洪武初年创建石门书院，“聚书遗子孙，名曰山庄”。^[3]

书院沉寂之时，士人仍有致力于其藏书之业者，原因何在呢？梁寅自记颇能反映其心态，记称：“余山岩之士……无田以获粳、稻、菽、粟，而所藏唯书，子孙守焉，无租税，无科需，而学之成也，又足以应上之求赞时之治，是吾之不念子孙而不立产业，所藏唯书，乃所以深念夫子孙者。”^[4]正是这种遗爱子孙或后生学子的情怀，绪斯文于不坠，使书院藏书在最艰难的年月仍能不绝如丝，得以勉强维持。

弘治年间（1488—1505），书院不兴的局面已经打破，院中藏书之业也日渐受人注意。西南如云南蒙化府，署知府胡光在弘治年间建有明志、崇正等书院，派人“直往江南中州市群书，贮于观文楼。于是，云南诸学积书之富，惟蒙化为最”。^[5]西北如陕西西安，提学王云凤在弘治九年（1496）修复正学书院，“建楼广收书籍，以资诸生阅览”。^[6]陇州崆山书院建崇经阁，藏书万卷，“凡州郡之俊秀未籍于庠校者，皆聚学其间”。^[7]宋元旧院如号称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长沙府岳麓书院，弘治年间同知杨茂元重修时，即“增公田，储经书”，重建尊经阁。当时所藏之书目，载万历年间的吴道行《重修岳麓书院图志》第四卷，计有《四书大全》、《易经大全》、《书经大全》、《诗经大全》、《礼经大全》、《春秋大全》、《性理大全》等七部，皆为官颁之书，可以视为国家标准读物。这些都表明，书院藏书已经从明初的低迷之中走出，进入上升发展之途。

正德开始，明代书院进入大发展阶段，其藏书建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历嘉靖、隆庆、万历凡一百一十余年（1506—1620）而不衰。兹各择要介绍，以明发展概略。

正德年间（1506—1521），如辰州知府戴敏在三年（1508）创建崇正书院于府城，以宝经堂为藏书之所，“其制前为重门，中为文会堂，左右为斋舍，各三十余楹，后为祠十六楹，以祀濂溪、二程、横渠、晦庵、南轩诸贤，后又为宝经堂”。^[8]从其祭祀对象强调程朱道统，我们可以感知到宝经堂所藏当侧重于理学著作，与当年的官方哲学思想相符合。

嘉靖年间(1522—1566),经正德时期的积累之后,心学与书院一体而风行全国,院藏图书也发生变化。王守仁、湛若水以领袖身份分别为浙江绍兴稽山书院、安徽广德复初书院的尊经阁作记,批评了当时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提出了具有浓厚心学特色的尊经主张。其“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六经者,吾心之记籍”,“六经觉我者也”的观点,已大不同于官方之学,虽未明讲废书不读,但它的必然结果是不重视书籍,直接导致了书院藏书不能与书院同步形成盛势的局面,藏书事业与同期的书院大发展的辉煌相比,形成了极不协调的冷热大差距。然则,冷清并不意味着不发展,其时的书院藏书事业,与正德以前相比,仍然长进不少。

藏书楼建设方面,甘肃徽县徽山书院建藏经阁藏书,以资多士;湖南益阳龙洲书院尊经阁高五丈,分三层,深广各以其度;广东合浦尚志书院有崇正门、克复堂、崇经阁、环翠阁、号舍、射圃等;浙江慈溪慈湖书院,为宋元旧院,嘉靖年间重修时,建有横经阁藏书;杭州虎林书院的藏书楼,与明贤堂、友仁堂、博士孝廉厅、会馔延宾所等建筑并峙;绍兴稽山书院有尊经阁;江西安福复真书院建有藏书之阁,院中师生捐书至数千卷,有诸经、诸史、诸子,俾学者探讨;泰和静斋书院有万卷楼藏书,邑人御史大夫陈文鸣凭其藏书“集解五经”,撰写著作多至百卷。^[9]制度建设方面,江西白鹿洞订有《整书事宜》,规范院藏图书的保管与修补工作,而且将院藏书目分成按照年月开载的备查性和考经史子集而类附的分类性两大类,皆颇具特色。所有这些,虽不得以繁荣相称,但也足以证明其发展程度已达到相当高度。

隆庆、万历五十余年间(1567—1620),书院藏书事业仍处于攀升阶段。在河南,隆庆二年(1568),永城县太邱书院建藏书楼三间,位于讲堂之后;万历六年(1578),辉县知县聂良杞重修百泉书院院舍,购书二十六部凡二百七十五册置于藏书阁中;三十八年,商丘范文正公书院创建藏书楼三楹,与讲堂、文昌楼、文正公祠并峙。在江苏,万历年间,东林书院藏书五部四套三十四册;万历三十四年,常熟虞山书院藏书二百六十五部,分为十一个类目,著录于《虞山书院志》中。在福建,万历四十六年,提学副使岳和声扩建福州共学书院,收藏图书二十七种凡七百一十三本,书板九种凡二百二十七片。由此可见,各地藏书楼建设和购求图书以供师生探讨研习的努力不断,整个书院的藏书事业仍处于爬升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强调的是,从总体上而言,这个时期是王、湛的弟子尤其是再传弟子在主导书院的发展,空谈心性,束书高阁的末流之弊尽显,它对书院的藏书事业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制约了其发展势头。而同时,它也招致了有识之士的不满和批评,作为心学末

流的“反动”，学术已回趋于“道问学”的程朱一派，书院藏书在反弹中得以继续向前发展，并且形成了有别于正嘉时期的鲜明特点：其一，对于书的认识有些改变。如福州共学书院，引用陈献章白沙先生的话，教诸生“以我观书则开卷有益，以书博人则释卷而茫然”^[10]。常熟虞山书院也认为，“书籍者，博学之助也。以人博之如淮阴之用兵，岂患其多多哉！”“读书用世，千条万派只是一源，识得源头便是真用世”，教诸生“能受书籍之益，而不沦于玩物丧志之累”。^[11]虽然仍在强调“我”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但已无昔日“六经皆我注脚”的张狂之气，承认书籍为博学之助，不应束之高阁，而后藏之多多。这种趋于平实的认识上的改变，有助于推进书院的藏书建设。

其二，院藏图书渐多程朱学派著作。如无锡东林书院所藏五部书为《文公家礼》、《朱子年谱》、《朱子说楚词》、《朱子注释韩文全集》，全都与朱熹有关。辉县百泉书院所藏二十六部书，除史书十八部外，其余为《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文章正宗》、《大学衍义》、《文章正宗钞》、《大学衍义补》、《六子》，没一部是心学著作。这些院藏书目，反映了当年学术从陆王反归程朱的变化。

天启以降，朝廷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战火烽起，书院大多毁于兵乱，明代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在还没有形成盛大局面的情况下，其势即告跌落。

二、心学思潮影响下的藏书规模

与前代书院藏书和同期的官府、私家、寺观藏书相比较，明代书院藏书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受王、湛心学思潮影响，藏书规模不大。

明代书院藏书确有数目可考的不多，除前述岳麓书院七部、岷山书院万余卷、复真书院数千卷、静斋书院万余卷、百泉书院二十六部凡二百七十五册、东林书院五部四套三十四册、虞山书院二百六十五部、共学书院二十七种凡七百一十三本之外，明来时熙《弘道书院志》载，院中考经堂藏书数千卷；《明史·李敏传》载，紫云书院“聚书至数万卷”；《明史·郑善夫传》载，鳌峰书院藏书至数万卷。另有江西白鹿洞书院，可以找到连续的记载：明李梦阳《白鹿书院新志》卷八《书籍志》，著录正德年间院藏图书八十部存一千三十八本；明郑廷鹄《白鹿洞志》卷十一《白鹿洞学交盘册序》载，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前，院中计有图书一百二十一部，四十五年清点，计有一百七十二部；又郑氏同书卷十六《白鹿书院续增书籍总目》著录嘉靖年间官师赠书六十八

部凡三百五十三本,《白鹿书院类分书目》著录嘉靖年间所有现存院藏之书,总计一百七十六部一千九百四十本;明周伟《白鹿洞书院志》卷三,著录万历年间的院藏图书一百八十八部凡二千四十七本;明李应升《白鹿书院志》卷十五,著录天启初年院藏之书一百九十七部凡一千八百五十五本。

以上白鹿洞的藏书,从正德年间的八十三部,历嘉靖、万历而天启,增至一百九十七部,发展虽缓,但总体则呈上升之势,实可以视作明代书院藏书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由此及彼,可以知道全国书院藏书之概略。白鹿统计不及卷数,但以书目推算,也就是数万卷而已。以鳌峰、白鹿书院之数万卷与宋代鹤山书院的十万卷、元代草堂书院的二十七万卷及西湖书院的二十余万卷相比,实在是差距太大了。其藏书规模既前不及宋元,也后不敌清代,这就是明代书院藏书的境况。

何以明代书院曾经辉煌,其藏书事业却始终不成盛势,形不成较大规模呢?推究其原因,问题主要在那些创造辉煌的书院建设者们对于藏书的态度上。我们知道,明代前期书院不受重视,嘉靖、万历、天启间又历遭禁毁,只是由于有王阳明、湛若水等大师及其后学的苦心经营,书院才终成大势,再创辉煌的。而这一代的书院建设者们,是以发挥心学为己任的,他们钟情于书院的讲学、会讲,其知识结构不同于宋元“道问学”的一代,重悟性而轻积累,对图书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以湛若水为例,王门高弟邹守益创建广德州(今安徽广德县)儒学尊经阁,“居六经于其上,而习诸生于其下,凡为阁三间六楹,而列二翼于前为燕居,会之以门为复初书院”,因请湛若水作记,记曰:

甘泉子曰:“夫经也,所由以入圣人之径也。或曰警也,以警觉乎我也。传说曰‘学于古训’。夫学觉也,警觉之谓也。是故六经皆注我心者也,故能以觉吾心。《易》以注吾心之时也,《书》以注吾心之中也,《诗》以注吾心之性情也,《春秋》以注吾心之是非也,《礼》、《乐》以注吾心之和序也。”曰:“然则何以尊之?”曰:“其心乎!故学于《易》而心之时以觉,是能尊《易》矣;学于《书》而心之中以觉,是能尊《书》矣;学于《诗》而心之性情以觉,是能尊《诗》矣;学于《春秋》、《礼》、《乐》而心之是非和序以觉,是能尊《春秋》、《礼》、《乐》矣。觉斯存之矣,是故能开聪明,扩良知。非六经能外益之聪明、良知也,我自有之,彼但能开之、扩之而已也。如梦者、醉者,呼而觉之,非呼者外与之觉悟也,知觉彼固有之也,呼者但能觉之而已也。故曰六经觉我者也。”^[12]

既然聪明、良知我心固有,六经所起的作用仅在于唤醒那固有的聪明、良知,使其觉之、开之、扩之而已,那么其逻辑推导的必然结果就是,当聪明、良知“觉之”以后,